

中国的



和文化

意识

郑涵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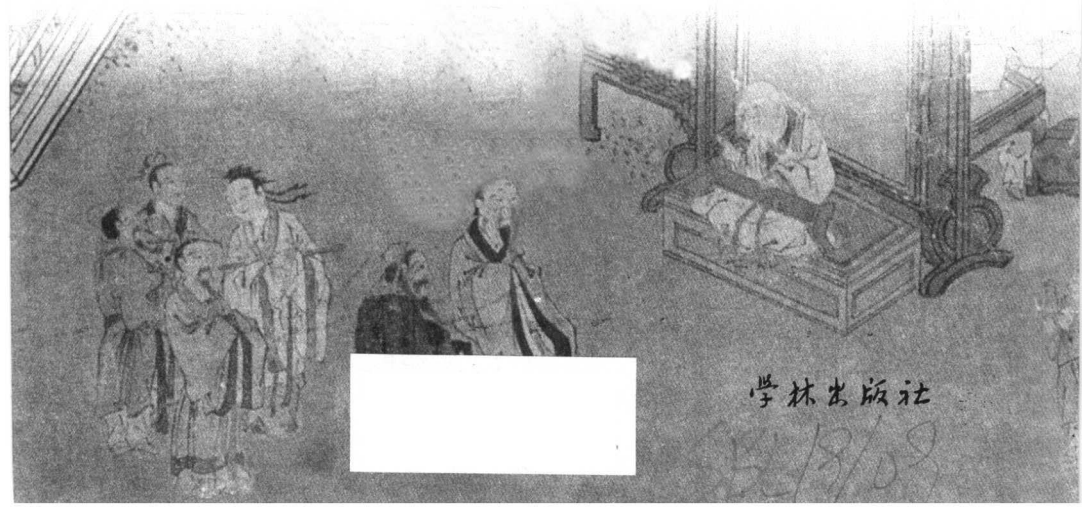
学林出版社

B210.5

Z433

郑
涵
著

中国的 和文化 意识



学林出版社

85/8/0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的和文化意识 / 郑涵著. —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5. 1

ISBN 7-80668-869-2

I. 中... II. 郑... III. 哲学—研究—中国—古代
IV.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8247 号

中国的和文化意识



作 者——郑 涵 著

特约编辑——盛晓玲

责任编辑——吴耀根

封面设计——周 鸣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 64515012 传真: 64844088

印 刷——上海港东印刷厂

开 本——889×1194 1/32

印 张——8.25

字 数——17.5 万

版 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4000 册

书 号——ISBN 7-80668-869-2 / B·44

定 价——18.00 元

序

吴中杰

郑涵与我颇有些缘份。上世纪 80 年代中,我开始招收硕士生时,他恰好大学本科毕业,前来报考,成为我的首届硕士生;到得 90 年代末,我即将停招博士生时,他从国外归来,又来攻博,几乎成为我的末届博士生。我说“几乎”者,是因为在我宣布停招博士生之后,系里负责研究生工作的副主任在我赴港讲学时,又将一名直升生安置在我的名下,所以郑涵就不能算是我的关门弟子了。否则,开门弟子和关门弟子成为同一个人,倒也有趣。

郑涵在欧洲留学多年,却没有去拿一个洋博士学位,这在别人也许觉得很可惜,但他自己却很坦然。因为他本不以学位为意,所感兴趣的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所以在欧洲,他读了不少书,接触了很多新知识,而且背起背包,到处旅游,考察欧洲古代文明,感受欧洲现代文化,着实长了不少见识。他回国后之所以仍要到复旦来攻博,倒不是对于博士头衔感兴趣,而是为了无法对抗国内过分讲究学位的形势,目的是要获得大学教师的资格,而大学正是读书的好地方。对于这点,我完全能够理解。的确,时下倘无博士学位,不但难以在大学里立足,就是在别的单位,也要受到挤压。近年来考研热愈来愈旺,就与此种体制有关。这未必是一个好现象,但愿研究生本

身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在复旦中文系研究生迎新大会上曾经说过：“希望研究生们，无论是硕士生或博士生，都不要把自己看得过高，更不要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你们硕士生博士生，还有我们这些硕士生导师和博士生导师，其实大抵都只能算是中等水平或中上水平的学人。低水平的人当然进不了我们这个圈子，高水平的人却根本不在乎什么学位，如陈寅恪，在国外读了十几年书，就什么学位也不要，因为他有的是学问。”我讲这些话，当然很得罪人，但却得到在场研究生的普遍认同。

郑涵也与我辈相若，所以他在欧洲浪游归来，为了谋生，为了找个适宜于读书的环境，还得弄个博士学位。但是看他对于教授职称满不在乎的样子，觉得他还是一个超脱的读书人，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时下学风浮躁，学者争做学科带头人，单位竞为“基地”、“中心”，在这种形势下，粗制滥造、弄虚作假到处可见。郑涵并没有卷入这股泡沫浊流，仍旧在沉潜读书，有了心得，再执笔为文，虽然写得不多，但是较为扎实。

摆在我们前面的这本《中国的和文化意识》，由两部分组成：正文是中国古典美学中“和”的范畴的研究；附录为作者近年来对文学批评理论和实践的探讨。前者是由博士论文修改而成，后者则是硕士论文的选题。对这两个题目，郑涵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

比如，为了研究“和”这个审美范畴，他读了许多人类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古文献学和哲学、历史书籍，加以综合论述，说出了“和”的深层底蕴。论文从原始社会到明清时代，比较系统和完整地综述了“和”的历史风貌，较全面地总结了

它的基本特征,富有创造性。特别是将“和”文化的形成与远古的原始崇拜、巫术仪式和天人合一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发前人所未发。本文在进行史的叙述的同时,还对中国古代“和”文化意识形态的结构方式进行了探讨,力求做到史论结合。作者将阴阳关系看作中和意识形态的基本结构方式,是符合实际的,而这一认识,就将“和”对中国文化的全面渗透性,给揭示出来了,这是一个重要的见解。对于文学批评的研究,则注重理论性与现实性的结合,打破了那种纯抽象的范式,这是有利于文学批评的发展的。

当然,这些见解都是探讨性的,并非什么定论。但郑涵的治学是认真、扎实的。

引 言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意识,强调多元的和谐、异质的协调与对立的消解,于有限中呈现无限,无限而又回归有限,追求至真至善至美的圆融。金景芳先生说中与和是做事的方法^①。其实不仅如此,和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集中表现,博大精深,意蕴错综复杂:一方面是万事万物相应互涵,各适其位,另一方面是或雄浑刚健,成己成物,立己立人,或纯任自然,无为而无不为;一方面不偏不倚,不执不黏,另一方面是生意勃发,自然澄明,情、理、德有序融会,天人一贯,既浩瀚又微妙。方东美先生以诗化的语言表达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思考:“中国哲学的智慧乃在允执厥中,保全大和,故能尽生灵之本性,合内外之圣道,赞天地之化育,参天地之神工,充分完成道德自我的最高境界!……总括此中根本精神,千字万语一句话,便是‘广大和谐’的基本原则,在这种广大和谐的光照之下,普遍流行于其他文化的邪恶力量终将被完全克服。”^②中国“哲学智慧的形成并非单独成就,哲学的高度发展总是与艺术上的高度精神配合,与审美的态度、求真的态度贯

① 金景芳:《论〈中庸〉的“中”与“和”及〈大学〉的“格物”与“致知”》,《学术月刊》2000年第6期。

② 方东美:《方东美集》第171~172页,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

串成为一体,不可分割,将哲学精神处处安排在艺术境界中”。^①当然,以历史主义加以考察,中国传统文化的太和境界有浓厚的保守性与很深的局限性,方东美先生多少忽视了裂变、对抗、矛盾在文化发展中的重大作用。

中国的和文化意识突出的是文化的多元调和。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家芮斐德教授 1956 年在《乡民社会与文化》一书中,提出了在较复杂文明中存在大传统(精英文化)与小传统(大众文化)的观点。李亦园先生运用芮斐德教授的理论,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大小文化传统,指出:“追求均衡与和谐以及三层次系统的和谐(自然、人、社会的整体和谐——引者注)是中国古代文化无论大传统或小传统所共通的价值核心所在。”^②这样一种广大和谐的文化精神也是中国古典审美意识的最高理想,是一种人人相和、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圆融完美与生生不已的境界。

① 方东美:《方东美集》第 45 页,群言出版社,1993 年版。

② 李亦园:《人类的视野》第 142 ~ 148 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年版。

目 录

序(吴中杰)	1
引 言	1
第一章 中国古代的和和文化意识探源	1
第二章 铜石并用时代与夏商周三代人文之和	51
第三章 贵和尚中 天人相协	87
第四章 人和与天和	115
第五章 中国古代的和和文化观念的意识形态结构	135
主要参考文献	168
附录一 中国古典建筑中的宇宙意识	179
附录二 文学批评对象浑合论	184
附录三 历史艺术批评原则新探	232
后 记	252

第一章 中国古代和文化意识探源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和与中互为体用,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为了探索其历史渊源,有必要以新石器时代与西周为分界线加以考察^①,而不能以先秦笼而统之。

在中国哲学与美学史上,虽然公认西周末年的太史史伯最早从理论范畴意义上阐释和,但和的观念由来已久,至少可追溯到新石器时期,乃至旧石器晚期。了解中国古代和文化意识在夏商周三代及其以前的含意,这对于深刻把握以后和的人文意义及其发展变化都是极为重要的。可是,古人对此已不甚了了。春秋的杨朱就说:“太古之事灭矣,孰志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觉若梦;三王之事,或隐或显,亿不识一。”^②不过,今人可以结合古文字学、考古学、文献学,推断和的原初意义。

从发生角度而论,和文化意识首先表现为人们在跟自然的现实交往过程中历史地形成的人与自然的族群和谐感。这种和谐感,一方面在具有审美性质的外在对象(诸如石器、玉器、岩画、陶器、乐器等)形态中获得塑造与确证,另一方面在主体内积淀而成一定的文化心理(包括审美意识),而原始人

^① 本文依据苏秉琦的观点将石器时代分成旧石器时代(180万年前至1万多年前)与新石器时代(1万多年前至公元前3500年)。

^② 《列子·杨朱》,《列子集释》,杨伯峻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

在原始崇拜的诸多仪式活动中,以幻想的形式进行半自觉的反思,则产生出和文化意识的神圣内核。

一、人与自然的族群和谐感

从考古材料上推断,中国和文化意识最早大约可以至少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已经形成天、地、人、神交通应合的宇宙观念。

在漫长的早期农耕文明的物质实践过程中,中国先人逐步形成人与大自然的族群和谐感,并且构成注重整体和谐与有机联系之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因子,开中国文化之先河。在甲骨文中,和即稣。修海林先生运用古文字学,并考之以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氏族村落,以为稣从形制上看是由房屋、篱墙、庄稼组成的一幅早期农业社会氏族村落的景观图貌:“犹如一首形象化了的田园诗,其中洋溢着一种生活的谐和感”,“所透露的,是‘安居足食’的内心谐和状态。”^①仰韶文化村落形态的确呈现出新石器时代人与自然相和谐的一面。有的学者已经进行过形象而又准确的描写:仰韶文化的氏族村落,其房屋形制的半地穴式无论圆形、方形,皆是从地面向下挖一土坑再搭架盖成。屋顶大都作尖锥状。另有于地面建起的圆形房屋,屋顶亦是口小底大,用来贮藏粮食等。居住区周围环绕着一条深宽数米的壕沟,可能是人工挖成防御野兽袭击的设施^②。仰韶文化氏族村落典型地反映了中国整个新

^① 修海林:《古乐的沉浮》第169~172页,山东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② 《中国历史的童年》,第75~80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石器农业聚落形态。徐中舒先生认为中国大陆曾普遍存在一种原始社会的村社共同体,它就是“利用丛生的灌木,如荆榛棘楚之类构筑居地的外围,既以之防御邻敌之侵扰,也避免野兽伤害禾稼。这个外围也就是《国语·吴语》中所记载楚灵王‘乃匍匐将入于棘围,棘围不纳’的棘围”。^①当代考古学已经将这类农业聚落文化^②推至公元前7000年左右。石兴邦先生认为中国大陆高级采猎文化向农业文化的过渡发生于距今15000~10000年期间,约10000年前完成^③。湖南澧县彭头山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农业聚落文化,距今约9000年,有世界上目前发现最早的稻谷稻米、壕沟和墙围,人口约在350~500之间^④。距今7000~6000年的陕西临潼姜寨一期村落遗址,四周不仅有壕沟,壕沟内侧还有用篱笆或栅栏做成的寨门与瞭望的哨所^⑤,另外,寨内部已形成了稳定的小家庭与氏族组织^⑥。

这样一种古远的农业聚落文化,是在极其漫长的历史演进中产生的伟大文明,是跟公元8000年前后冰河期结束、气候转暖以及黄河与长江中下游降雨与土壤条件良好直接关联

① 徐中舒:《先秦史论稿》第9~10页,巴蜀书社,1992年版。

② 徐中舒先生说:“古代的社范围较大,它是以地缘关系的部落为组织单位。部是较小的居住区,落和略、络、格都是周围有所包围的意思,部落就是有山川、陵墓等自然屏障同外面隔绝交往的‘小国寡民’的独立区域。”(《先秦史论稿》第299页,巴蜀书社,1992年版。)王家范先生说:“自进入农业经济时代起,我先民才开始转为定居或半定居(即一定时期后的游动)的生活方式。群体以血缘关系的聚落(也可叫村落),成了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出发点,社会组织最基本的集合单元。”(《中国历史通论》第21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③ 石兴邦:《中国文化与文明形成和发展史的考古学探讨》,载《亚洲文明》第二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④ 《中国文化报》1998年2月8日第1版。

⑤ 详见严文明《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⑥ 详见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的。浸染其间,我先民自然产生万事万物似乎周而复始、与生俱来的恒久感;在野兽出没的宏大神秘而又充满风险的自然界,依托坚固的村落,按照极有规律的习俗生活,我先民必定形成跟居无定所构成强烈对比的安定感,一种安全而有根的感觉,并且伴随着丰收的喜悦与以血缘为纽带的浓郁的原始亲情,由此在心理上构成自然之和的集体潜意识:顺应自然,稳定和平。古人就有所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①我们古代有巢氏的传说曲折地传达出上古巢居文明的伟大意义:“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②“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③

二、审美心理的原始积淀

可以说,自然之和既是本原内容,又是人文之和形成的基础。自然之和是人类在悠久的生存实践中所创造的人与自然的深刻契合,自然与人之间形成彼此对象化的生命纽带,在客体方面表现为对人而言自然由混沌变为有序,呈现和谐的规则,具有有意味的形式;在主体方面表现为人具有了感受与享受自然形态的能力,换言之,就是自然成为美,而人萌发了

① 《帝王世纪·击壤歌》,《帝王世纪》第二,刘晓东本,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② 《庄子·盗跖》,《庄子译注》,刘建国等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③ 《韩非子·五蠹》,《韩子浅解》,梁启雄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

审美心理结构。旧石器时代的岩画与陶器及其纹饰就是实证。

(一) 石器与玉器

多种装饰品的出现是中国旧石器晚期文化的一大标志。这证明大约一万年前原始人已经有了爱美的观念。例如,周口店山顶洞人骨化石旁所发现的装饰品主要有七类:穿孔石珠、穿孔砾石、穿孔兽牙、穿孔青鱼上眼骨、穿孔海蚶壳、鸟骨管、鱼背椎骨等,它们应该是头颈部的佩饰、项饰、坠饰^①。“所有的装饰品都相当精致,小砾石的装饰品是用微绿色的火成岩从两面对钻成的,选择的砾石很周正,颇像现代妇女胸前佩戴的鸡心。小石珠是用白色的小石灰岩块磨成的,中间钻有小孔。穿孔的牙齿是由齿根的两侧对挖穿通齿腔而成的。所有装饰品的穿孔,几乎都是红色,好像是它们的穿戴都用赤铁矿染过。”^②这一文化时期石器制作工艺已有了明显的长足,修理台面成为普遍现象,许多地方还运用打击法和压制法生产细石器,不仅石器种类趋繁,诸如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锥、钻等,而且采用锯、切、削、磨、钻等技艺加工形形色色的骨角器,诸如锥、针、鱼叉、刀、铲等。石器工艺的发展使得具有审美价值的装饰品的产生成为可能,而无论是石器及其工艺,还是为数众多的装饰品,都透露着当时人们对于色泽与形态的感知、把握与创制能力。其后玉器的制作则标志着远古先人对于自然对象质地的审美能力。

中国玉器文化发达很早,在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良

① 苏秉琦主编:《中国通史:远古时代》第3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② 贾兰坡:《“北京人”的故居》第41页,北京出版社,1958年版。

渚文化、红山文化、龙山文化遗址中就出土了大量美丽精妙的玉器。我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玉器是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山西省峙峪遗址中的一件水晶小刀^①,而距今 7000 年前浙江省余姚河姆渡遗址发掘出土的二十多件用玉石与萤石制作的装饰品,则揭开了中国玉石文化的序幕^②。河姆渡遗址位于杭州湾南岸的宁绍平原,20 世纪 70 年代末被命名为河姆渡文化,其第四层的十几个碳 14 数据显示出这一遗址层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 5000 年前后。河姆渡居民使用玉莹石制作璜、玦、珠、饼形、九形饰品。

虽然,在中国旧石器晚期与新石器早期石器与玉器饰品还是非常粗糙,但是却清楚地展示了人开始超越人与自然的实用性关系,人与自然的亲切和谐关系升华到了审美高度。这些石器与玉器饰品在光、形、质的调匀谐和特点,不正折射出原始人追求自然和谐的审美意念吗?

(二)岩画

史前岩画在世界许多地区都有发现,其中欧洲洞穴岩画举世闻名。自一百多年前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穴岩画为世人探见以后,人们在法国南部与西班牙北部等地发现了很多史前洞穴岩画,拉斯科克斯洞穴岩画是最精彩的代表之一,1989 至 1992 年法国马赛附近发现的科凯斯洞穴岩画也震动世界。据法国史前史研究名家安德列·勒鲁瓦·古昂统计结

① 贾兰坡:《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2 年第 1 期。

②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 年第 1 期;陈兆复、邢琰:《原始艺术史》第 1212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

果,在岩画主题中动物占绝大多数^①。中国史前考古(陶器、骨器、石器等)也表明中国原始人最先注意的不是日月星辰与山川河流,而是动物与植物。这从一个侧面证明:和文化意识的原始形态,无论是实用性的,还是审美性的,首先根源于在原始族群生活中孕育而成的人与自然的交往关系,动物与植物因而成为人所欣赏与表现的对象。

中国在世界上发现与记录岩画极早。《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讲:“赵主父令工施钩梯而缘播吾,刻疏人迹其上,广三尺,长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游于此’。”尽管如此,迄今史前岩画在中国发现很少。内蒙古磴口县格尔敖包沟岩画与内蒙古乌拉特旗中韩乌拉山的大角鹿岩刻,有专家以为很可能是一万年以前的作品。这一论断主要依据动物图形辨认的方法来推断岩画年代的,理由是:其一,格尔敖包沟岩画上刻了七只昂首而立的鸵鸟,在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差不多无处不见这类鸵鸟化石,而其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里却从未发现过鸵鸟化石,据此可以推断鸵鸟曾经是北方原始人类重要的狩猎对象,格尔敖包沟岩画可以归入同一时代;其二,韩乌拉山岩刻内容是大角鹿,这种角大、近似掌形的大角鹿出现于约一百多万年前,到距今一万多年前已经绝迹,据此可以推定韩乌拉山岩刻至迟产生于旧石器时代晚期^②。史前人类在世界各地有许多基本相似处。欧洲旧石器晚期的岩画里各种动物类型的多寡跟当时动物存在状况相仿。因此,内蒙古磴口县格尔敖包沟鸵鸟岩画与乌拉特中旗乌拉山大角鹿岩刻极

^① 安德列·勒鲁瓦·古昂:《史前宗教》第101~10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② 陈兆复、邢琰:《原始艺术史》第3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有可能跟欧洲史前洞穴岩画同属一个年代断。

(三) 陶器

如果说从中国史前岩画方面寻找中国和文化审美意识之根极为困难的话,那么陶器则为我们提供了比石器与玉器远为明确的证明。

中国原始陶器的形制以及刻痕与图案之发展演变,生动、具体、完整、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原始族群的和谐意识。中国原始社会陶器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跟玉器相差不大。在中国古代传说中,皇帝、尧舜时代始制陶器,实际上要早四五千年。现代考古发现,陶器最迟在距今 8000 至 9000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出现了,著名的遗址有河北武安磁山、河南新郑裴李岗、甘肃秦安大地湾、浙江余姚河渡等。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广西桂林甄皮岩两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神仙洞的原始泥质红陶片距今一万年以上,也许是目前发现最早的陶片^①。这些陶器形制多样,实用性强,形式美明显;其纹饰主要是篦点纹、孤线纹、划纹、指甲纹、乳钉纹、绳纹、剔刺纹、网状纹、锯齿纹等,图案跟当时的自然物(动物、植物、生活器具、河水等)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对应关系。因此,无论制陶工艺,还是陶器的饰纹图案,都反映了原始人跟自然的亲密和谐的关系,表现出原始人对以和谐为主导的审美形式的一定驾驭能力。

中国新石器时代依历史先后可以划分为彩陶、黑陶、白陶、印纹陶等。其中彩陶最为重要。1921 年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新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标发现彩陶后,在甘肃、青海、陕西、宁夏、河南、河北、山西、山东、江苏、四川、湖

^① 《简明陶瓷词典》第 67 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 年版。